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〇期 ——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2c)

【知情者说】吴法宪回忆录 (节选)	吴法宪
【文革内幕】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	舒云
【往事回首】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	吉伟青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 (之三)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知情者说】

吴法宪回忆录 (节选)

• 吴法宪 •

◇ 林彪斥江青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上午，叶帅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这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们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林彪往外走。叶群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说道：“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不满，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双方的斗争，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庐山会议。

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 中央文革的检讨

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帅和徐帅，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都没有来，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做出解释。关峰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

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之后，与会的同志争着发言，要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发言，严肃斥责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黄永胜的讲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说：“你这样说，是指责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徐帅这时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说几句话替黄永胜掩盖一下。他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嘛！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些，大家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以后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问题一下子就追到了徐帅身上，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帅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是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以后徐帅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消声匿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和军委扩大会议这样的一个气氛下，是分不开的。

~~~~~

## 【文革内幕】

###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

• 舒 云 •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毛泽东八次接见 1

100万红卫兵，把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从此燎原了整整10年。

—

红卫兵组织诞生在清华附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学校。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批评校方对运动领导不力的学生聚集在圆明园，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6月2日，他们在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

6月初，北大附中、石油大学附中也成立了类似红卫兵的组织。刚开始，红卫兵这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强行解散。

7月25日，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发表批判工作组的演讲，当场受到江青的称赞。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把他们写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出席大会的江青，请她转交，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作指示。

8月1日，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一个中学生的组织，值得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吗？原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师不利，江青等人搞的评《海瑞罢官》没有打中要害，又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只得另寻途径。

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江青讲话内容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更是对着中央领导人。彭罗陆杨被揪出来了。

5月8日，在江青等人策划下，《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开火》一文。《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矛头指向北京市委。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戚本禹发表《〈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结果北京市委瘫痪，彭真被打倒，吴晗、邓拓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此文件发到县团级。《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错误估计，号召全国人民向党政军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经毛泽东批准，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6月1日起，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

北京的红卫兵刚刚冒头，6月初，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中央八条，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要求在运动中做到内外有别，注意保密，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许多省市也相继派出工作组。“文化大革命”的刚烧起的烈火很快奄奄一息。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对刘少奇派工作组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在发动“文革”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运动的阻力太大，主要来自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二是运动的方针政策还不够明确，需要具体化。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师生代表。会议原定开五天，中心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但是全会开得很不顺利，不得不延长。毛泽东命令请病假的林彪出山，不来不行。

8月7日，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8月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篇文章，以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大会文件印发。

## 二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

这之后，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队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北京。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8月17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与会者并不仅仅是红卫兵。《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不过，毛泽东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但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两张毛泽东大照片，足以说明问题。一张是毛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招手，一张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鼓掌。这两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

这是红卫兵第一次被官方报道。

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被去掉。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

从此，红卫兵被推上历史舞台，从北京蔓延全国，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大串连，成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专有名词和强大的集团力量。

### 三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

从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才开始“排队”。10月18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3日，第五次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顺序下去了。

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1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完毕。

新华社报道，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第一张大字报”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5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因为8月的北京最热，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 四

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红卫兵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毛泽东的军装是新的，有点瘦。之后有人来信批评，为什么不给领袖一件合身的军装？其实这是毛泽东灵机一动。8月17日夜很深了，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当然可以穿军装，这本无可非议。但解放以后，尤其在公开场合，毛泽东从来没有穿过军装。他又高又胖，一般的军装不行，深更半夜到哪里去找特体军装呢？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幸亏想起来有一位警卫战士的身材和毛泽东差不多，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毛泽东为什么要穿绿军装呢？他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决心以战士的身分与资产阶级决

一死战，更表示人民解放军与红卫兵站在一边。当时在天安门城楼负责组织的同志说，那时候太乱，都打倒了，没有军队不成。老人家穿军装也表示对解放军的一个支持。

于是，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就成了那一个时代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绿军装成了红卫兵的标准服装，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时髦。

毛泽东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闪着红光。

然后，毛泽东戴上军帽，转身上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7点16分，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的副词。

大会结束后，像五一、十一那样，百万人盛大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几天后宋彬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讲述她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经过。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这个让她砰砰心跳的想法后，她对负责大会的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泽东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宋要武”。

另一个名叫杭生的军人后代也献给毛泽东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泽东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最先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看到毛泽东，他和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地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

红卫兵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

8月19日，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大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看见毛主席。因为他始终在天安门的下面，观礼台上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泽东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走，但红卫兵仍不满足，要毛泽东接见。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六个多小时了，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他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

怎么办？

周恩来和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量，找几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一下。谁去办这件事呢？周恩来想了一下，叫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科长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人，以北京军区为主。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地方干部一听说红卫兵，立刻就躲开了。作战科长郭春暄穿着军装，他不怕。而且他从50年代就搞五一、十一的节日阅兵，对这一套程序很熟悉。再说，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是无比崇拜的，他们听解放军的话，别人去红卫兵不一定听。一共四个观礼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个观礼台都跑到了，和红卫兵头头“谈判”，请他们选出三四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

红卫兵代表也是又渴又饿，他们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说，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周恩来没有办法，吩咐让北京军区出动汽车团，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全拉到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太多，汽车团跑了一趟，没有拉完，又跑了一趟。周恩来给红卫兵们讲话，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走，下次接见一定让你们见到毛主席。

工作人员都说，真想不到红卫兵想见毛主席的心情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回来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当时的天安门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 六

不仅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他那时有两句话，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

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啊。其实让毛泽东见一次群众很困难。在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门城楼又怕出事。工作人员找了很多地



方，都不合适。这种接见，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就成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形势那么乱，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上下功夫了。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是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的地方用屏风隔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

几十年后，时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的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待了。记不清是哪一次，毛泽东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动了，红卫兵围住了车，有的甚至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才发现毛泽东的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泽东首先到金水桥，警卫赶紧劝他上城楼，好一阵子才劝走。接见完，毛泽东自己又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恩来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周恩来。大家一齐站毛泽东的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泽东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才上车走了。另一次，毛泽东接见完红卫兵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几十个记者也蜂拥上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泽东接出来。

周总理同意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

再接见保卫组就把摄影记者“铲”了很多，只剩下两个人。没想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熟悉的摄影记者都没来。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周恩来火了，为什么不让他们上来？现在怎么办？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事后总结，周恩来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也难怪保卫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甚至有红卫兵被挤死。

## 七

组织接见很不容易，很费事，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为了让红卫兵更多地见到毛泽东，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而且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考虑周全。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恩来急了，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只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咪咪地来了。

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

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

哪种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记得，那一年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想法倒不错，但队伍从东往西走，计划两三个小时，却拖了四五个小时。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不想多看一眼呢？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的检阅方式了。确定地点后，几个小时内，沿途的厕所和卫生站等一套程序就安排好了。组织是严密的，但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泽东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

第二次接见选择在下午17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在前面开路。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第二次，毛泽东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9月15日下午17点15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20点15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10月1日，接见150万人。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11月3日是先大会，后游行。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泽东乘车检阅了150万红卫兵。

## 八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联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除了第一次，后来接见的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握手，也不说什么话，主要是集合时间长。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主席更多地见到群众，也可以解决群众看不清毛泽东的问题。这第八次，毛泽东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领袖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环城”，只是车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有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

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

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只好下车。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

第二天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泽东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快挤崩了。把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动员来维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周恩来到了，张德斌给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张德斌着急，怕主席很快到，就说得快了一点。周恩来说，不要讲这么快，讲慢一点。汇报完之后，周恩来说，光这样讲不行，你带我走一圈。还没转上一圈，毛泽东就到了。主席刚过，红卫兵就涌上来了，海浪一般。后面的警卫车一下子被挤坏了不说，还伤亡了两个人。真是险之又险。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天越来越冷了，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再加上后来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就算了。

这样，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报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

于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就由第八次而成为最后一次。

~~~~~

【往事回首】

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

• 吉伟青 •

◇ “文革”时的“阎王殿”

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江青一伙在上海密谋炮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和中央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后来又印了小册子，北京也没有发行。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等对北京市委、中宣部编造的一些谎言，说：1962年十中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当康生、江青造谣说到中宣部扣发了戚本禹、关锋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文章时，毛主席更为愤怒，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动学术权威，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此，中宣部即称为“阎王殿”，整个机关秩序混乱，无法正常工作。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先在办公大楼楼道张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吉判官张口结舌，负隅顽抗》，写的是批斗会上，我反驳造反派诬陷我与北京市秘书长高戈通电话，传消息，搞阴谋的内容。继后大字报越来越多，只得在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中央派到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原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阎王，正副处长（即正副司局长）是判官（后来这位领导也被“四人帮”打倒迫害）。此信息传开，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响彻中宣部大院内外。于

是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并要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当时在部里的副部长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我是黑帮X X X”）到街上去游斗。

全国大串连开始后，中宣部大院楼内楼外，人山人海，乌烟瘴气。接着北师大学生代表进驻，把剃光头的“判官”押着到办公大楼打扫厕所，对这些人动辄拳打脚踢，开口即骂。我们宣传处处长王宗一不堪受辱，在家服毒自杀。另外，康生传出话：姚臻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他也是含辱太甚自杀身亡。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初，部里开会还由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召集，大家称之为“维持会”。突然，“四人帮”指使陈伯达写条子，派人接收中宣部办公室所辖的机要、秘书、档案和人事的权力，这就宣布撤销了部长们的职务，也正式罢了我的“官”（我当时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紧接着，部长们，如张子意、周扬、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童大林等陆续被抓起来，关进秦城监狱。只有张际春副部长未被监禁，但剥夺了他应享受的待遇，他的车也没收了。张际春年老多病，折腾了一个多月就病故了。俟后，中央又派熊复、刘祖春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上任不到两个月也罢了官，和部里的处长、副处长一起关进了“牛棚”。中央又从兰州军区调来几位团以上的军官，对中宣部实行军管。

◇ 从蹲“牛棚”到五七干校

1967年下半年，中宣部实行军管后，大部分干部留在机关，应付全国大串连到中宣部来看大字报的接待事宜，又抽调一部分人看管我们这些“走资派”。大概是九月间，军管组带领一部分革命群众押解着我们住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二号楼。名义说是办学习班，目的是加强对“走资派”的集中管制，集中突审，要我们集中精力写交代材料，并配大小会的批斗。刚去的时候，还让我们每星期回家一次，不久就不准我们回家了。一天，于光远到医院看病，时间晚了，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回到“牛棚”，受到批斗，并在院中罚站半天，晒得他满头大汗。过往的人都心中不满。“牛棚”管理人员只好允许家属每两周探视一次。原来我们是四个人住一间房，还有床睡觉，以后改为六个人一屋，睡水泥地板，铺上稻草把行李放上，人挨人的挤着睡。一层楼地板潮湿，人多空气污浊，加上伙食缺乏营养，闹病的不少，我就患了急性静脉炎，住院延迟，打了十几天的点滴，才停止发烧，而炎症一直不消，医生说是变成了慢性静脉炎。我的左下肢总是肿胀，疼痛不已。在冬天严寒的早晨和漆黑北风凛冽的晚上，都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冻的浑身发抖。在这里如同坐监牢，不能随便出入楼道，大小便都得向看管的人请示。

1968年9月，军管组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受管制的“走资派”，一律要到宁夏五七干校。此时，我爱人包湘君也下放到五七干校，我的两个孩子要到农村插队，除留我母亲在北京外，举家大搬迁。由于我受“审查”，工资不发，只发生活费，经济上十分困难，要每个人准备一套生活用品，根本没有钱去买。包湘君去军管组索借我的工资存款。军管组起初不借，包湘君据理力争，才借给只供我准备行装的几十元钱。万般无奈，只好向朋友再借了些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从北京去宁夏的火车上，听到干校先头部队回来的同志念一首形容银川的打油诗：一条马路（从火车站到城市终点），两座楼（邮局一栋，自治区政府一栋），三个警察（从火车站到城市尽头的交警），四个猴（公园中只有四只猴子），实在对银川有些贬义。

宁夏的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常年气候变化无常。本来是回族地区牛羊很多，但在银川却

买不到羊肉。我们干校所在地，是距银川百多里外的贺兰县的一个空闲下来的劳改农场。劳改犯都呆不下去的地方，干校却在那里安营扎寨。除了有十余排破旧草屋，一片荒凉景象。

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到干校来了两百多人，编成两个连，一连在化建（地名），二连在财贸（地名），相距也有五六里路。我们这些“黑帮”被编到每个班组监管。班组长按部业务组和办公室下的科室划分编制，甚为严密。“黑帮”有专人看管。

艰苦的生活开始了。五六个人睡一个土炕，我夹在中间，夜间鼾声此起彼伏，空气污浊，臭味熏天。顿顿是白菜煮豆腐，大部分是吃窝头或馒头，很少吃米饭。一星期或十几天才能吃一次肉。当时，因我患有静脉炎，照顾不去大田（即水稻田）劳动，而安排在菜地种菜，除草施肥，每天都是日出（饭后）而作，晚饭时归队，几乎是一天到晚泡在菜地里，累得筋疲力尽。原来宣布的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村庄离干校较远，见不到农民，只是请过一两次农民（每次两三人）到干校来讲生产情况。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代之以抽时间就安排对“走资派”一个一个地进行批斗，交待“罪行”，以便对每个“走资派”定性结案。

◇ 静脉炎算啥子病？怎能不去干校

因为我患慢性下肢静脉炎，每天腿都肿得很粗，又疼，走路不方便。下干校的命令下达后，我曾提出腿不能劳动是否就不去干校，而放在留守的班子里。军管组根本不予考虑，说什么：静脉炎算啥子病噢！熊复患心脏病都得去干校，你这根本不是理由。把我顶回来。包湘君即去军管组，说：医生说老吉的病没有痊愈，还有发展的可能，弄不好还可能截肢，要求军管组允许暂时不去，等再治疗一段时间好转再去。他们就是不答应。到了干校不到一个月我的腿病发作，根本不能下地。经干校医务室医生多次交涉，批准我到银川医院治疗，一住就是半年多，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控制病情，没有发展，炎症渐消，才捡了一条腿，直到现在，这条腿走路还有些瘸。

◇ 刘祖春晨练太极拳被诬为“垂死挣扎拳”

随同我们这批“黑帮”下干校的人员中，有两个中宣部副部长，一个是熊复（原中联部副部长），一个是刘祖春（原华北局宣传部长），他俩调到中宣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革命”小将打成“保皇派”、“走资派”，和“判官”们一起集中到市委党校接受审查，然后与我们一起到干校劳动改造。

当时，刘祖春已年届五旬，腰腿关节有病，过去在家里每天起床后到院子里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一天早晨，他在干校院里练太极拳，被军管组的人发现，立刻上前制止，并把“黑帮”们召集起来训话：你们这些人，到这里来是劳动改造的，除劳动和写检查材料外，不准乱说乱动，更不准打什么“垂死挣扎拳”，要记着你们是有罪的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听后一片哗然，怎么把太极拳叫“垂死挣扎拳”呢？事后，中宣部的干部向校领导反映，说“太极拳”是我国传统的一种健身拳术，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把它叫“垂死挣扎拳”是错误的。军管组的负责人一听慌了手脚，毛主席肯定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叫，必须马上纠正，于是又把我们集合起来郑重地说：今天上午批评刘祖春打的那个拳，不是“垂死挣扎拳”，是“太极拳”，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是可以打的。今后只要你们不耽误出工、写检查，早晨起来打个拳，组织是允许的。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 熊复犯心肌梗塞倒在贮菜窖口

1968年初冬，一车车大白菜从贺兰县城和立岗镇运到干校大食堂广场上，准备往早就

挖好的一个很大贮白菜的地窖里搬。一到冬天，白菜和萝卜就成为干校的当家菜。军管组发出指令，革命群众押着“走资派”，分成两班，轮流把大堆白菜倒腾到菜窖里。在第一天运送大白菜的我们这个班的前头，突然倒下一位老者，他就是患有心脏病，而且心肌梗塞过两次的熊复同志。只见他卧在地上，脸色苍白，口吐污物，浑身抽动。当时场内一片混乱。校医给他含上硫酸甘油，然后让车紧急送往银川医院抢救。他的家属在现场哭着说：熊复这是第三次犯心肌梗塞了。他这样的病人，根本不能到干校来，更不能参加运送白菜这样的强劳动，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熊复躺在吉普车里，颠簸几十里转到银川医院。生命垂危，经抢救，在银川住了一年多，一直未治好。

◇ 袁水拍对驴大喊：“同志，站住”

袁水拍是原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身高羸弱，完全是一个“五谷不分”的书生。干校分配他工作，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初让他放鸭子，因为干校二连买了一批小鸭子，准备喂大了改善伙食，由于喂养不当，相继死去，只剩下三只小鸭子，让袁水拍赶着在田间地头或路边放养。一天，三只小鸭子被路上的行车给压死了，他后悔莫及，像做错事的孩子，在路边哭泣，然后向领导作了检讨完事。后来又安排他喂驴，并在豆腐房做下手，由他把做好的豆腐装在驴拉的车上，从驻地送到贺兰县城一副食店，回来的时候拉回一些油盐酱醋及佐料。有一次他赶着驴车回来，离驻地还有三四里地方，路上的汽车鸣喇叭，把驴吓着了。驴拉着车越跑越快，袁水拍坐在车上惊恐万状，又不会喊让驴站住的口令。他惊呼大叫“同志，站住！同志，站住”，连连呼叫多次毫无作用，驴拉着车直奔驻地马棚而去。驴停下来后，袁水拍吓得面如土色，因他有肺病，大口吐血，于是就让他休养。从此，再也不让他赶驴送豆腐了。

◇ 于光远的“特殊大米饭”

于光远原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次也是以中宣部“黑帮”的一员到干校。他是上海人，在饮食上对北方人的面食（馒头）和玉米“窝头”，一见就发愁，最喜欢吃大米饭。可是干校由于自己种的稻谷，头一年颗粒无收，靠买大米，每周也就吃到一两次米饭，大部分是馒头或窝头，而且吃窝头的次数更多。于光远也在想办法如何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每次吃馒头和窝头时，他不要馒头而要窝头，大家都觉得奇怪，不吃细粮而要吃粗粮，结果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买了窝头后把它搓碎，像粒粒米饭状（比米饭粒大一些），放在菜碗里混合一下，当做米饭吃，吃起来还津津有味的样子。所以当时有的同志就留着窝头给于光远换馒头吃。在干校里盛传于光远创造了窝头米饭，也叫“于氏米饭”或“特殊大米饭”。他的这一发明，成为干校一大笑柄，而他却显得其乐无穷。

干校领导把于光远看成科学家。他经常与管种田的同志研究，盐碱地的稻田种的稻谷，为什么颗粒无收，经研究：（一）是盐碱地种稻子，头一件大事就是放水压到什么程度，才能不使盐碱冒出来，这要请教当地老乡，摸着压水规律就好办了。（二）是缺肥，就派人到乌达县买化肥。（三）是田间管理太差，草长得比稻谷还高，呈荒茎状，于是加强田间管理。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第二年稻谷达到每亩高产七八百斤。大家都说于光远在解决种稻田的问题上有功。这样食堂伙食大有改善，每周吃米饭的次数有所增加。

平常于光远的任务是养猪，他就想尽一切办法研究猪饲料配方的问题。他养的猪又肥又大，大家由每月吃两次肉，改为每周吃一次肉。伙食改善了，大家对他大加赞扬。

◇ 我喊“没有醉”是翻案

每年春节干校革命群众都会餐，而我们“黑帮”没有资格参加。1969年春，第一次在干校过春节，发给我一斤白面、一斤菜、半斤白肉，让我自己做着吃。我不会做饺子，愁得闷

闷不乐，春节的夜晚一个人坐在炕头上，涕泪沉思。最后，只好做了两碗疙瘩汤，喝完倒头睡去。

1971年12月，经过多次批斗，我写了多次违心的检讨后，军管组宣布解除对我的管制，也叫做“解放了”。就在这年的春节，原中宣部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为庆祝我的“解放”，特邀我参加办公室同志的会餐，而且安排我坐到多数是女同志的餐桌。大家欢欢喜喜，大吃大喝。我第一次参加和革命群众同桌会餐，很是高兴。同志们连连不断的劝我喝酒，女同志都是一杯对一杯的碰杯喝光。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有预谋——就是使我认为女同志不会喝酒来劝我喝。我失去警惕和控制，结果他们有的喝的是白开水，我喝的全是白酒，就这样喝呀喝呀，把我灌得烂醉如泥。散席时，我走不了路，有两位同志驾着我往院里走。我反反复复地大喊：“我没有醉。”这时被军管组一同志发现，说我有意翻案，说自己“没有罪”。第二天，又组织人批评我，说我明目张胆地喊“没有罪”。我反复解释，办公室的同志也帮着解释说，他喊的是没有喝醉的醉，不是翻案的意思，我才免遭一劫。

◇ 有妻携子女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爱人包湘君在宁夏青铜峡水利部五七干校，距我们干校也就一百多里路。1970年春节临近，她准备带着两个插队的孩子和在农村上学的两个孩子到干校看望我，使我们几年没有见面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过个在慌乱中亲情交融的春节。于是她给我们干校领导打长途电话，表示要来住几天。可是干校军管组不同意，在电话中说什么“吉伟青还在受管制审查时期，家属不能来探视。干校也无法安排房间住，还是不要来吧！”包湘君一听此言，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回敬电话中的人，她愤怒地说：“吉伟青受审查，但他不是犯人，你们干校也不是监狱。我和他相处二十多年，我相信他不是走资派，不是‘黑帮’，不是坏人。为什么不能相见，我不是去探视（探监的意思），而是我们一家人失散几年没有见面。我们两家干校虽然相距只百多里路，平时根本不能相见，只有春节放假才能请假。我们是去过春节全家相聚的，至于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大干校腾一间小屋没什么困难。我已经拿定主意，你们不同意，我也是一定要去的。我准备腊月二十九起身，不多说了，就这么定了！”弄得军管组无言答对，直说这女同志真厉害，也只好认了。

包湘君带着子女从青铜峡坐汽车到银川，已是晚上十点多了，长途公交车没有了，她们携带一些吃的用的大包小包，徒步从银川到干校。一路上小孩又困又累又饿，我爱人就领着大家唱歌、逗笑，几十里路走到天明才到。干校领导腾出了一间空房，土炕上铺上稻草，就算给我们安了个家。好心的同志们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还送来家用的炉子、锅碗瓢盆。我们很受感动。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小屋的土炕上，过了一个温馨愉快幸福的春节。之后，有的同志对包湘君说，人家说你真厉害。她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他们这号趋炎赴势的人，不讲人道的人，不厉害行吗？

◇ 别了！五七干校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给全国司局级以上干部进行体格检查，这是天大的好事。干校领导组织我们这批“走资派”（大约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两位准司局级干部，科学处龚育之，理论处何静修。所谓准司局级干部，即部长会议讨论过提拔为副处长，但尚未任命。他们和我们一起住牛棚）到银川最大的医院去做体检。结果查出许多同志有这种或那种病症。我和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的心脏病较重，T波倒置，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军管组认为银川医院检查的不一定准确，又联系军队的医院对我和林涧青进行检查，结果和银川医院检查的一样。恰在这时，熊复因为长期住银川医院不见好转，他的家属给周总理打了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疗。不到半个月，周总理办公室就通知干校让熊复同志回北京治病。我和林涧青也向军管组提出要

求，回北京治病，但迟迟不作答复。

1972年春天，包湘君所在水电部干校撤销，给干部分配工作。包湘君提出不参加分配，要求调到我们的干校等我的问题解决后一块分配。经两个干校协商，包湘君调到我们的干校，和我生活在一起，等待将来分配。从此，我在干校有了个家。她来后惊讶地发现，烧炉子的煤球放在屋檐下晾晒，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了一片雪白的元宵似的球状，可见当地水碱的厉害。

自从有了家，我爱人除去食堂打饭外，还可以自己做点可口的饭菜。当时干校规定，不准买鸡，只允许买鸡蛋，不知为何做这样荒唐的规定。包湘君不理那一套，又买鸡又买鱼（因地处黄河支流附近，鱼很多，鲤鱼、草鱼、鲫鱼应有尽有，价钱也很便宜，因为当地人不爱吃鱼）。我真正享受到家庭的幸福和快乐。当时照顾我不下大田，而在菜地劳动，早出晚归，蹲一天菜地也是很累的，筋疲力尽，而且经常夜里在菜地小棚子里值班，一团团的蚊子大肆叮咬，实在痛苦不堪，彻夜难眠。即使如此，我一回到家，就觉得一股暖流溢满全身。舒适的生活，使我心情舒畅，体会到爱是人间最美好、最奇效、最快捷医治身心苦难的良丹妙药，我尽情地享受着。

1972年五月间，军管组突然批准我和林润青回北京治病。这一大好消息立即传遍全校。很多同志给我们送行，帮我们搬东西装车，还说你们回去就不要回来了。大家也预感到干校快结束了，很多同志都欢欢喜喜地送我们上路，自由、和谐、安乐是人生多么美好的生活氛围啊！

1972年的七八月份，中宣部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了。在干校撤销前，军管组总想在中宣部的“阎王”、“判官”中，揪出一两个走资派。他们集中精力打于光远的主意，搜肠刮肚网罗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大会小会讨论想把于光远定性为走资派。他们这一行径，遭到中宣部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也只好不了了之。

1972年10月，军管组开始分配干部，把吴寄寒（中宣部教育处处长）、郑必坚、龚育之、罗劲柏和我等六七个人分配到当时由迟群、谢静宜（“四人帮”爪牙）把持的所谓科教组工作。与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斗争是复杂的，又是微妙的，很难用墨笔简单说清。直到1976年中宣部还没有恢复，中央只成立一个宣传组，由耿飚负责。中宣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那场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被“四人帮”明目张胆地践踏达十多年之久，真可谓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历史。

（2004年10月间85岁老翁写于友谊医院病床）

□ 《百年潮》2005. 10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三）

• 徐海亮 •

## 二、陶铸、王任重新指示

北京运动发展总要比武汉快，中央精神总要比湖北省委理解的革命化得多。8月22日，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常委陶铸电中南局：“中央最近开了一次会，有个极其重要的指示。



从最近各地运动的情况来看，许多情况说明，还是怕字当头，不敢叫群众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学生是有觉悟的，为什么不相信学生群众？要大破大乱，才能大立。怕乱也还是要被群众革掉，必然要叫群众革掉。告诉各省（区），各地，要彻底放手。对学生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去压制，要坚决撑学生的腰。这次运动工农兵是主力军，学生是先锋。对军队，中央已发出通知，要坚决照办……不要怕，乱的越厉害越好”。“总之，不能提‘保卫中南局’，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谁都可以提。”

次日，陶铸在医科大学再发表同样的重要讲话，就谈到后来批判的“怀疑一切”问题：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黑帮是保不住的，反革命终究是反革命，现在我收回前面那句话。给同学打保票，一打就不好。不是黑帮揭也不是黑帮，是黑帮讲不是也是黑帮。卫生部可以充分地揭，……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由人民来考验。

“现在撒手让你们揭，不管是谁，大家尽力揭……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发挥人民的精力。……至于一个系统、一个支部、一个部的党委，是可以怀疑的。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能怀疑。领导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们不信任就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怀疑，观察你的领导……

“放手不够，要大放特放。可以公开，也可以秘密串联，怎样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管你资格多老，权力多大，只要你是革命的，就可以贴。你们还可以到街上去革命，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每个人只有支持你们的权利”。

8月19日，长沙出现动员工人、干部围攻学生事件，中央决定采取疏导措施和处理省、市委，不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回马长沙，收拾起火的湖南后院。

为了研究日渐控制不住的运动，24日，湖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张体学省长做了自我批评：“学生产生问题，一个是革命的旗没有举起来，二是工作组官僚主义，毛病不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下：一、放手搞大革命，放手搞大民主，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成立红卫兵就成立。你要上街就上街。你要干什么，可以的。要到长沙、北京去，可以的。你要打庙，支持他去打，不采取这个精神，我们就被动了。革命总有一点损失。我们要放手领导，参与领导。要大民主，大鸣大放。对学生的行动要支持，反对派、左派都要支持，要他们辩论。学校内部的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大辩论，工学院的问题，我主张开万人辩论会，我们省委派书记去坐着，轮流去，可以辩三个月。他辩累了就不辩了，游行累了他就不游了。打架也不要紧，打了以后再辩论对不对？有两个学校可以控制的，一个是武大，一个是湖大。汉口、武昌准备乱两个月，在乱中作工作，乱中有治。水利学院再乱，先把张如屏（按：院长、第一书记）停职反省。二、武汉市常委、书记、副书记到各学校作报告，支持革命。武昌中学我们帮你们搞。三、红卫兵要成立全市组织，我们同意，红卫兵主任由侃夫当，你去领导。

张华（副秘书长）：不这样搞，不能取得领导权。

张体学：我们决心把党委改组改错了不要紧。工作队要回来斗争，大家讨论该不该斗？该斗争就斗。要放手搞大民主，搞得不好，湖北省委、市委是西安、兰州的前途（按：两市委业已改组）。

姜一（书记处书记）：学校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实质上是左派和右派的关系问题。如果搞得左派和中间派成了多数，搞得不好，右派和中间派成了多数。

许道琦（书记处书记）：我们一方面要领导学生，另一方面要做工作。（体学：反对派有极少数右派操纵，经过大辩论，他觉悟了，就过来了。）辩论，做工作双管齐下，有少数很偏激的。

张体学：不怕出乱子，可能不出乱子，怕出乱子，可能要出乱子的。学生的要求，能办到又合理，如破四旧立四新，你要干支持你。……现在已经乱了，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乱，参与领导，把领导权夺回来。唯一的办法是辩论，支持他们干，不采取这个办法，你要硬扭就不行。乱一个月就好了。

张体学意欲抛出水电院张院长替罪，平息众怒；实际上当时已经抛出了水电院一个抓后勤的梁百辅副院长作为“走资派”，戴上高帽批斗，其他高校也纷纷由多数派操作了抛当权派的“斗批改”。同日，省委召开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

陶铸也电示中南局：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三）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四）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

（五）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但是中南地区学生与党政机关的冲突，并未解决。研究后，陶铸同意与赴京学生对话，解释一些学生提出的关键问题。25日，陶铸率原中南局领导接见中南赴京学生群众。

张平化重申了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我在这里再次向同学们检讨……犯错误的人要负责，我工作没做好，留下影响，我也要负责”。

接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讲：“外地有人说，中南文化革命冷冷清清，没有北京轰轰烈烈。是这样！希望大家学习北京的好经验，带回去……”“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市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要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镇压群众运动，就应该打倒。下面陶铸同志还要讲。湖南问题，昨晚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鼓掌）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热烈鼓掌）……”

陶铸在这次接见学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即兴讲话，显示了他们对形势和做法共同的意见，特别显示了陶铸本人对文革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看，身居要职，他当时是想尽力跟上

形势的，而一些提法，也特别革命化和出格，如像对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可怀疑炮轰，对于破“四旧”，对于大串联，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认识，甚至一些言辞比刚刚起来的武汉学生还要激烈、离谱，关于“什么是党的领导”，几乎成为少数派在9至11月的理论武器，至于对所谓“保守派”如何办，群众几乎就是按他说的去实行的：

△ 运动中问题由谁负责？——“我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文化革命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要由我负责。前不久，我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他们按中央精神彻底把文化革命放手搞起来，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敢放手。长沙、桂林不但没有搞起来，而且发生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群众要革命，你压制，就是反革命。我不是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吗？我有责任。……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现在有好转。王延春同志搞四清，农村阶级斗争是坚决的，但搞文化革命不那么坚决……我看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农村四清搞别人能搞下去，现在搞自己就搞不下去了……。”

△ 省委可以反对的——“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都要受一次检验。三反、五反、土改、四清，湖南是坚决的，这次文化革命不坚决，原因是没有勇气真正革自己的命。好多同志要求罢王延春的官，看一看好不好？我今天打电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看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统撤职……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文化革命像一江洪流，抗拒这个潮流要被冲洗掉。你要阻止这个潮流，你就要被彻底毁灭的。现在有的单位不懂得这个道理，怕！你怕有什么用呢？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来不知你有问题，一怕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呢？相反的，你是不革命，你是黑帮，怎么保也保不住。这些道理我过去讲了，他们懂得，就是不做，怎么办呢？（众：造反）就是靠你们起来，不革命的统统革掉。……”

△ 不满意中南地区的运动——“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我们还是要靠你们去轰。对省委、市委、中南局开炮！比如王延春你们就开了炮嘛！你们回去说，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开炮了！就要罢官！（众：罢王延春的官！）打几炮看看动静嘛。还说这是我说的，现在给一个机会，如果不革命就罢官……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国际歌》说，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还不不懂，现在我开始懂得了。西单、东单、王府井的旧招牌被砸得粉碎，一块块掉下来了，不是落花流水嘛！灰色的、兰色的，黑色的要砸烂，红色的当然要保下嘛！……这次革命要彻底打下消灭阶级的基础！（鼓掌）……”

△ 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委各级领导可不可以反对？反对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反对党中央？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筹委会不行就罢他的官！（同学们：人太少罢不了！）罢不了可以串联嘛！串联了一定的力量起来，就把他们轰倒。

△ 文革委员会可以推倒再造！——“文化革命委员会压制革命，你们就把它推倒，那是二月革命，就来个十月革命……”“现在北京的各个学校里实际上都有几个红卫兵，可以货比货嘛！

看谁红的厉害。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我们开展革命竞赛，假的一比就比出来了。都是好的可以合起来。真的、假的，革命是最好的检查，群众有眼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红卫兵的组成原则——“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地调查成份，我们要讲阶级观点、阶级路线，要有阶级分析。同学出身比较好的，所以阶级成份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份，但是我们反对唯成份论。第一要讲阶级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三看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就是出发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

△ 关于串联和交通问题——“北京是首都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革命人民都有权到北京来。（同学说：没有路费）你们有学校证明，可以免费。（同学又说：他们不开证明）你们搞个组织嘛！（王任重：上下结合嘛！）不开证明，学生证也可以（同学：车站不可以）不可以，斗争嘛！（王任重同志插话：陶铸同志可以帮助你们到铁道部解决。）对！我到铁道部去，你们坐车可以不要钱，免费。你们这次可以免费回去”。

可以说，这是在长沙事件之后，陶铸对运动和中南地区做法的一个积极的全面表态。从群众运动角度而言，严格地从表象与运作实质来看，此后4个月——迄至陶铸被中央文革“抛出来”，武汉的造反运动尚未突破以上由陶铸口头提出的基本原则。

25日，湖北省委常委也召开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发言：“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脱离群众……找工作组开个会，先把工作组的头按到水里去，不按下去不能平民愤。二、有一条重要经验，准备犯大错误，作最坏的准备。不管怎样激烈的斗争，或风暴，只要我们的观点明确，完全可以把学生说服过来的。学生的革命要求，完全支持他，如北上南下的问题，那么讨论什么时候去，告诉文革小组办公室，给你交通工具，要经费我们给。我在华师讲，那么闹革命，把房子烧了它，我也赞成。有事我们就亲临前线，到现场去，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去，越是矛盾尖锐的地方，领导先去解决，不能回避矛盾。我们省委犯错误，没有迅速采取湖北大学的办法，如果所以工作组采取这个办法，一检讨就主动了。……四要靠领导，领导哪一步棋走错了，就（要）打招牌的。工学院不这样搞，很可能到省委来，反对派一包围省委，湖大、武大要出来那就遭了，就变成湖南了。不要把工作组都搞臭了，搞臭了再回不去了，只有靠革命委员会领导。现在正是乱的时候，我们乱是向好的方向乱，不同于湖南。

张体学这里还是主张积极面对省委错误的，不过，又准备舍弃工作组（“先按到水里”），而且湖大是省委意图和正统力量占上风的典范，其他学校仅仅是错在未如湖北大学那样占主动。这里讲的反对派即指少数派，张省长这里担心湖大、武大保卫省委的正统群众出来与少数派冲突，出现湖南的问题，应该说还是较为明智的。但他未能如愿引导好，结果反而是亲自组织多数派学生乃至工人、干部围攻南点火批判省委的学生。

为了公开承认错误，次日张体学省长曾经到华中工学院电影场大会讲话，承认省委为工作组压制学生负责，对于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冲突（在公开辩论时业已出现反对派），张对华工师生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说“你们现在两派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友军之间打了一场误会战。现在应当消除误会，共同对敌了。而敌者，就是学院里象朱九思那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干毅之类的反动学术权威”。“你们应当把力量集中在他们头上”，张鼓励说，“要抱紧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张体学同志的讲话不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反工作组的一派同学们都高兴极了，工作组是省委派出的，现在连省委主要领导人都承认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并且向受压制师生公开赔礼道歉，那还不是造反派的大胜利吗？而保工作组的一派从来都是乖乖听命于上级领导的，既然省里的主要领导人都说工作组犯了错误，那他们还能去说三道四么？所以也表态坚决拥护张体学同志的讲话。

张省长作误伤比喻，还是比较恰当的，不过回避了并非误伤，而是官方误导！本来学生群众内，有何根本利害冲突？即便领导打群众“反革命”，学生还想“省委、院党委搞错了吧”？父母也会错打孩子的，不是流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吗？受压同学只是有委屈情绪，还没有想反对领导。张的平俗、刚直的话语，一时也得到拥戴省委的青年学子的赞同。不过有了一打，后来又有二打、三打，王任重打罢，张体学也打，王、张不打了，还有人打，且往死里打，造反学生认识也发生变化，“是我错了，还是‘你’变了”？认为搞来搞去，修正主义就在这里！革命有了对象，对立情绪也逐渐产生和发展。

8月26日，省委召开书记碰头会，张体学说：“湖北大学现在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来这里串连，长沙、西安的都有，追‘六·二〇’事件，很可能打仗。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外边去革命？为什么把我们的身份暴露了？我对漆林（按：湖大大多数派学生头头，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领袖）讲，准备革命委员会被推翻，越暴露越好。

“武大、湖大可能重新搞翻的，内因外因在一起，准备它翻，告诉革命委员会，第一，准备下台；第二，热情接待；第三，要你办什么，满腔热情开会答复，要北上就北上，要南下就南下，兵对兵，将对将，搞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湖北大学支援湖南大学革命”。武大再翻一下才好，哪个学校越闹得凶应该越高兴，有这个思想就好办了。从工学院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群众基础，证明学生完全相信我们省委是革命的。

“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对可靠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要帮助一下，每天去了解情况，华师、农学院是学生当的主任，没有问题，学联主席转变为主任的是不可靠的。工学院革命委员会不要保它，武大的要保护。冲击越大越好。

“我们不怕乱，准备乱，越乱越好，乱有三大好处。省委的同志都到各大专院校去开会讲话，我们高姿态，就不会失败的。长江大学叫史子荣去管，（韩）宁夫不要回工学院去了。我们到学校去准备两手：一是准备挨打；二是受欢迎。坏分子要把湖北省搞成黑帮，我们就会被围住的。

“曾淳的问题，在下星期见报，陈一新的问题也要见报。文革办公室搞一个小稿子，见了报以后，省委同志分头到学校去讲话”。

湖北省委在做自我批评的同时，已决定抛出省委某些早已被边缘化的领导转移目标。

8月27日，陶铸电中南局：提出以下意见，请中南局讨论决定：1、长沙情况，现在很乱，不要怕。中南局也要坚定，不要因此受影响。2、湖南省委要回长沙去。省委负责同志避一下风头是可以的，但害怕，离开岗位是不对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十六条纲领，坚决站在大多数革命群众一边。3、延春同志要彻底检讨一次，开大会，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这个检讨要印出来，广为散发。讲清楚湖南是毛主席家乡，要搞好。省委要挺起腰杆来。……6、群众要求交出长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可以。但要向学生讲清楚，要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省委有错必改，但真理必须坚持。同群众讲清楚要听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各回各校，继续辩论。长沙有坏人活动，要按十六条讲一下，警惕和防止坏人活动的问题。

陶铸对中南局与湖南问题的指示精神，依然是面对一些运动实际问题的。

同日，湖北省委常委召集会议，省监委负责人纪辉谈到：“长江（工程）大学局势比较混乱，左派、右派可能各是一半”。张体学问：地、富、反、坏、右子弟占多少？纪辉答：杀、关、管的占百分之四十，成分复杂。张体学明确指出：“炮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

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账，不能在一个学校算的”。“华师附中、农学院附中没有问题，水果湖中学控制不住”。他依然认为长江工大局势太乱，原因在于“五类分子”子弟比例大，成分复杂；该学校可以突破平均比例划右派。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市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省市两次会议都强调“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25日，市委全会也要求教育干部认识破四旧的正常秩序。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005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